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丹麦】龙伯格 著 李真 骆洁 译 张西平 审校

# 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J.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B979.956.5  
M147

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

【丹麦】龙伯格 著 李真 骆洁 译 张西平 审校

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S.J.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大象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丹麦)龙伯格著;李真, 骆洁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9. 1

(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 - 7 - 5347 - 5337 - 4

I. 清… II. ①龙…②李…③洛… III. 马若瑟(1666 ~ 1736)—人物研究 IV. B979.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3750 号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

作 者 [丹麦]龙伯格

译 者 李 真 骆 洁

责任编辑 李光洁

责任校对 裴红森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http://www.daxiang.cn)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纪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

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 出版说明

清代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在清代的外文文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仅研究西方汉学若不从此入手,就无法掌握和真正了解西方汉学的来龙去脉及其知识演化和变迁的内在原因,同时,研究中国明清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若不掌握入华传教士的相关文献,也无法进入其历史的内核。多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上,直接研究外文原始文献和档案的较少,翻译出版的史料也很有限,这或许是该领域的研究总是进展缓慢、鲜有创造的一个原因。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大象出版社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作,自1999年起组织出版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丛书,从基本文献的翻译入手,分三个系列向国内读者介绍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本书系已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五”期间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目前已陆续出版十余种。在继续致力于这一书系组织出版的同时,为配合国家清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将部分有关清代传教士著作和文献的译著,从这套书系转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编译丛刊”中出版,特此对读者诸君作一说明。

学术乃天下公器。清史纂修,世纪大事,我辈能参与其中,为之尽心,足矣!

大象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2004年6月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 中译本序

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清代法国来华的著名耶稣会士。他于 1698 年随白晋一起来华传教, 1733 年迁居澳门, 1736 年在澳门去世。<sup>①</sup> 马若瑟一生著述丰厚, 法国汉学家雷慕沙说他是来华的传教士中“中国文学造诣最深者”。<sup>②</sup> 他在华近四十年时间, 潜心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 著有《汉语札记》、《赵氏孤儿》(翻译)、《六书实义》、《书经时代以前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寻究》、《书经选》(翻译)、《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诗经》(八章, 翻译)、《耶稣会士适用之拉丁语汉语对照字汇》等中西文著作及译著二十余种。<sup>③</sup> 尽管同其他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

① 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 J.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p. 63,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另一种说法是他逝世于广州, 日期不详。费赖之说: “1733 年赴澳门。似在 1735 年歿于澳门, 月日不详, 而歿地亦不能必为澳门也。”见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 第 526 页, 中华书局, 1995 年。

② 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 第 528 页, 中华书局, 1995 年。

③ 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第 525—534 页中列出马若瑟有著作 25 种, 但少《经传议论》和《天学总论》这两部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著作。关于马若瑟的著作和书信至今并未有准确的统计, 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方可彻底搞清。

仁、白晋等人相比,他的声名并不显赫,甚至连一张画像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是马若瑟以其对中国语文和典籍的深入研究而在西方汉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丹麦汉学家龙伯格先生所著的《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中国语文学和索隐学派》一书,是目前西方学术界关于马若瑟研究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作者依据大量的原始文献给我们提供了有关马若瑟的丰富材料,使得马若瑟在清代历史和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以及中国语言学史中的地位逐渐清晰起来。

如果把马若瑟放入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来进行考察,就可以看出他个人及其研究在这当中的几大特色:

一、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堪称传世大作,对汉语语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与梳理,为欧洲汉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根据现在我们掌握的已经出版的资料,目前可以看到的西方人入华以后第一部关于中国语法的研究著作是多明我会传教士万济国(又称瓦罗)(Francisco Varo, 1627—1687)用西班牙文所编的《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这本书1703年在广州以木刻出版,<sup>①</sup>首开汉语语法研究之先河,功不可没,但书中真正探讨语法的部分不足30页。另外,由于他对中国文献、语法资料的了解有限(全书没有一个汉字),因而实际影响不大。

真正开拓了中国语法研究的正是马若瑟的《汉语札记》。这本书的拉丁文本1728年写于广州,1831年在马六甲出版,1847年才由裨雅各(J. G. Bridgman)译为英文出版。《汉语札记》在西方汉语学习史、研究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它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

马若瑟的书仅从中国各类文献中引用的例句就有一万三千余

---

① 考狄认为“1703年在广州出版《华语官话语法》已不是瓦罗的最初的编写本,他最初的版本只能在傅圣泽的书中看到”。见许光华:《16至18世纪传教士与汉语研究》,选自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6辑,第476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

条,虽然仍未脱离印欧语法体系,但他“力求越出欧洲传统语法的范畴”<sup>①</sup>,努力从中文文献本身概括出其自身的语法规律。无论从其规模、体系,还是文献的丰富性来看,将其称为“西方人研究我国文字之鼻祖”都是当之无愧的。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把这本书称为“19世纪前欧洲最完美的汉语语法书”<sup>②</sup>十分恰当。

(二)它是首次把汉语分成白话和文言两部分来研究的著作。

汉语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历来有很大区别,许多来华传教士在学习汉语时都体会到了这一点。马若瑟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汉语札记》中把白话与文言语法的区分作为全书的基本构架,白话部分的材料大多取自元杂剧和《水浒传》、《好逑传》、《玉娇梨》等小说,而文言部分的语言材料则主要取自先秦典籍、理学名著等。

(三)它是近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的奠基之作。

近代以来的汉语研究在三个地域展开,一是在欧洲本土,二是在港、澳、南洋一带,三是在中国本土,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对这三个地域的中文语法研究都产生了影响。

雷慕沙是“第一位在欧洲仅从书本了解中国而成功地掌握了有关中国深广知识的学者”<sup>③</sup>。他在1822年出版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书《汉文启蒙》(*E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被认为是欧洲“第一部科学的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论述汉语语法的学术性著作”。<sup>④</sup> 雷

---

① (法)戴密微:《法国汉学史》,见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第15—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963页,岳麓书社,1997年。

③ (法)马伯乐:《汉学》,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3集,第48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年。

④ (法)戴密微:《法国汉学史》,见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第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慕沙在书中就承认“受到了马若瑟语法书的启发”<sup>①</sup>。

在亚洲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与英国的金斯博鲁勋爵合作,1831年由马六甲英华学院出版了《汉语札记》的拉丁文第一版,1847年又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堂弟裨雅各将其翻译为英文,在《中国丛报》出版,<sup>②</sup>这说明在南洋一带活动的新教传教士对马若瑟的书一直十分重视。

在中国,1898年由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是在中国本土由中国学者所写的第一部中国语法书,王力先生把这一年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始之年。《文通》对中国语法学的建立功不可没,<sup>③</sup>但有些国外学者认为马若瑟的《汉语札记》“确实对《文通》起了影响,实际上也许可以说是马建忠在上海徐汇公学(Saint Ignace)教会学校读书期间,最早接触的语法著作之一……”实际上,我们知道当时该教会学校的耶稣会神父就是用这部著作作为语法参考书的。这样,我们不难看出这两部著作有着共同点,特别在组织结构方面。<sup>④</sup>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从史料和内容本身去加以论证,但贝沃海力(Peverelli)的意见有一定的合理性,说明了马若瑟的书和《文通》之间的某种联系。<sup>⑤</sup>姚小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一段很好的说明:“在世界汉语研究史上,《文通》并非第一部完整的、构成体系的汉语语法书,也并非第一次系统地揭示出古汉语语法的

① 何莫邪:《〈马氏文通〉以前的西方汉语语法书概况》,见《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 吴义雄:《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488页。詹姆斯·裨雅各也就是布里奇曼。

③ 说马建忠是“第一次为汉语草创了一个完整的语法体系”显然不妥,在此之前的传教士语法书已出版很多。姚小平的意见较为中肯,应在对马建忠地位的评价前加上一个“在中国学术圈内”或者“在中国语言学的历史上”这样一个限定语更好些,见《当代语言学》第1卷,1999年第2期,第1—16页。

④ (法)贝罗贝:《20世纪以前欧洲语法学研究状况》,见侯精一、施关淦主编:《〈马氏文通〉与汉语语法学》,第157—158页。

⑤ Peverelli,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1986.

特点。《文通》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语法学,打破了文字、音韵、训诂的三分天下,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向现代语言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文通》永远值得我们纪念,但对《文通》以前的历史,我们也应尊重,在那段历史未澄清之前,我们对《文通》的功过得失便不可能有全面认识。”<sup>①</sup>

龙伯格的这本书首次翻译和整理了马若瑟和傅尔蒙的部分通信,使我们知道了一些关于马若瑟《汉语札记》的重要历史性的消息。

首先,我们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到马若瑟对《汉语札记》所抱有的极大自信。马若瑟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十分推崇,这和他的索隐派思想有关。在他看来“学习汉语是最美好的,也是最能给人以慰藉的学习”,<sup>②</sup>当傅尔蒙告诉马若瑟有人写了一篇关于汉字过于简单而不能给人深刻印象的文章时,马若瑟心中不悦,马上反驳说:“汉字的组合是人类最高尚的成就;没有任何物理学的系统能像汉字那样堪比完美。”<sup>③</sup>因为汉字、汉语对马若瑟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同时也是一种理想,是他信仰的根源所在,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经书中可以找到基督教绝大部分的奥秘,中文的经书是写在大洪水以前的文献,即便后来这些经书被秦始皇烧毁了很多,但这些汉字保留下来了全部的秘密,所以,他认为汉语和汉字“是人类最高贵的成就”。他在信中说:“上帝一定引导了那个创造汉字的人,为的是把他降生之后启示给人类的第一个启示真理传递给最遥远地方的子孙后代。”<sup>④</sup>

从马若瑟和傅尔蒙的通信中我们也看出两人的纠纷和傅尔蒙的

① 姚小平:《〈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历史功绩重议》,载《当代语言学》第1卷,1999年第2期,第16页。

② 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 J.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p. 27,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③ 同上, p. 31.

④ 同上, p. 32.

为人。马若瑟为使傅尔蒙帮助他在巴黎出版这本书,可谓煞费苦心,当听说在巴黎很难找到这样多的汉字字模时,他建议将书分别在中国和巴黎两处印刷,先在中国印上汉字,后将书运回巴黎再印上拉丁文。此时他完全不知道傅尔蒙即将在巴黎出版一本 800 页的中国语法的书,后来当他看到了傅尔蒙所寄给他的作品后,马若瑟心中的愤怒难以压抑,他充满了对自己著作的信心和对傅尔蒙的鄙视,他说:“如果我在巴黎,出版了我的《汉语札记》,只需要三到四年就能使人们学会说汉语,读中文书籍,用通俗和古典的汉语进行写作。可是如果使用您的对开语法书,以及所有您能想象和创造出来的字典,我怀疑用十年时间都不一定能使一个人有能力阅读‘四书’。此外,这些书的印刷出版将耗费巨资,很少有人能买得起。最后,一个人是不可能从字典里学习一种语言的。”<sup>①</sup>

从实际情况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傅尔蒙的《汉语论稿》的确不是抄袭马若瑟的,<sup>②</sup>从马若瑟和傅尔蒙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傅尔蒙为了先出版自己的书,对《汉语札记》进行了批评,结论是“马若瑟的这部书稿与其说是传授语法,不如说是在传授小品词”<sup>③</sup>。从此,马若瑟的这部书被压到了国王图书馆,一直沉睡了一百多年,无人知晓。马若瑟把傅尔蒙作为自己作品的看护人,委托他出版,但实际上傅尔蒙却成为了马若瑟《汉语札记》出版的最大阻碍者,此人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也难怪有那样多的后人对他的人品进行批评。<sup>④</sup>

## 二、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和介绍是马若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

① 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 J.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p. 60,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1729 年 9 月 14 日傅尔蒙在收到马若瑟的书稿以前将自己的书稿交国王图书馆保管,1730 年 1 月 11 日马若瑟的稿件寄到巴黎。参阅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③ 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第 248 页,中华书局,2004 年。

④ 参阅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第 238、260 页,中华书局,2004 年。也可参阅 Cécile leung, *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 Oriental and Chinese Languages in Eighteenth - Century France*,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2.

的一个重要贡献。按照费赖之的介绍,他翻译了《书经》的部分内容和《诗经》的第八章。<sup>①</sup>但他所翻译的中国文化典籍中最有影响的是元杂剧《赵氏孤儿》。

陈受颐在评论马若瑟《赵氏孤儿》的翻译时说:“马若瑟的译文,我们今日看来,原是非常简略;阙而不译的地方很多,例如开场下白诗,差不多完全不译。但是原文的大体结构,尚能保存;而难明的地方,亦加注解,于当时读者,颇有帮助。”<sup>②</sup>所以,马若瑟的《赵氏孤儿》翻译尽管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毕竟开创了中国戏剧向欧洲传播的历史。

马若瑟翻译的法文版《赵氏孤儿》于1735年发表在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所编辑的《中华帝国全志》<sup>③</sup>上,第二年在英国就有了英文翻译本,<sup>④</sup>1736年底有另一个节选的译本,这就是瓦茨(Watts)的译本,<sup>⑤</sup>1748年有了德文本,<sup>⑥</sup>1774年有了俄文版。中国学者中最早注意到《赵氏孤儿》欧洲译本的是王国维,他在《宋元戏剧考》中说:“至我国戏剧译为外国文字也,为时颇早。如《赵氏孤儿》,则法人特赫尔特<sup>⑦</sup>(Du Halde)实译于千七百六十二年(1762);至千八百三十四年(1834)而裘利安<sup>⑧</sup>(Julien)又重译之。”<sup>⑨</sup>王先生

①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第532—533页,中华书局,1995年。参阅 P. Du Hald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the Second, Printed for J. Watts, London.

② 陈受颐:《18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载陈受颐:《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第15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

③ 该书的法文名称为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④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Tratarie*, Cave.

⑤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Watts.

⑥ *Ausführliche Beschreibung des Chinesischen Reichs des grossen Tratarie*.

⑦ 这是王国维先生的译法,现在一般译为杜赫德。——译者注

⑧ 这是王国维先生的译法,现在一般译为儒莲。——译者注

⑨ 王国维:《宋元戏剧考》,见《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41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所说的翻译者和出版时间都有误,他显然不知这是马若瑟所译,这点范存忠和陈受颐在文章中都已经指出。关于两个英文译本的关系范存忠先生有详细的介绍,<sup>①</sup>关于《赵氏孤儿》在整个欧洲的传播陈受颐先生也有详细的论述。<sup>②</sup>

如果谈马若瑟译本的影响,首先在于他介绍了一个完全和西方不同的戏剧形式,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完全崭新的东西,如杜赫德在介绍马若瑟这个剧本时所说:“读者们不能在这里(《赵氏孤儿》)找出三一律的遵守,时之统一,地之统一,情节之统一,在这里是找不到的;至于我们在戏剧里所守的其他惯例,令我们的作品精雅而整齐的惯例(指三一律),在这里也是找不到的。我们的戏剧之达到今日的完美者,只是近百年内的事情;在此之前,也不过是十分笨拙而粗率。因此,如其是我们见的中国人不守我们的凡例,也不该觉得诧异,他们原是向来处一隅,与世界的他部断绝往来的。”<sup>③</sup>《赵氏孤儿》正是由于这种在戏剧形式上与西方的不同,从而引来诸多的批评和讨论,这实际是文化间的一种相互影响。<sup>④</sup>

文化的传播和接受之间的距离相当大,马若瑟在向法国介绍《赵氏孤儿》时只不过在翻译时未译曲子,然而故事的梗概并未变,然而《赵氏孤儿》一旦进入了欧洲文化的视野,欧洲人对它的接受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文化和想象重新改写了《赵氏孤儿》,使其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欧洲戏剧。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哈察忒(Willia Hatchett)的《中国孤儿》和伏尔泰(Voltaire)的《中国孤儿》。

①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57—61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陈受颐:《18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载陈受颐:《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

③ 转引陈受颐:《18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载陈受颐:《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第15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

④ 参阅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111—118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伏尔泰对马若瑟所翻译的《赵氏孤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有甚于人们对这个大帝国所曾作和将作的一切陈述”<sup>①</sup>。而伏尔泰所以改编《赵氏孤儿》除了表达他对中国文化的崇敬心情,认为“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sup>②</sup>,更多是从法国文化本身的需要来说的。从直接原因来说,他是在回答卢梭对文明进步的怀疑,说明文明是可以战胜野蛮的,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中以张惕为代表的被占领者最终成为占领者成吉思汗的精神导师,就充分说明进步总要战胜落后,文明总要战胜野蛮。从远处讲,作为18世纪法国的思想领袖,伏尔泰正是企图通过《中国孤儿》宣扬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以批评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思想,通过《中国孤儿》说明开明的君主制是法国最好的政治选择。这是一种文化间的“借用”和“移植”,通过这种文化的解释来解决自己本身的文化问题和思想问题。这样的文化“误读”几乎是文化间不可避免的事情,正如梁启超所说:“伏尔泰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将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同胞。”<sup>③</sup>而文化间的“误读”、“移植”的基础是文化间的翻译,就此而论,马若瑟所翻译的《赵氏孤儿》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揭开法国18世纪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面。<sup>④</sup>

① 孟华:《伏尔泰与孔子》,第119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

②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0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③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见《饮冰室文集》第6卷,第115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④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参阅利奇温著,朱杰勤译:《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91年;孟华:《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995年;许明龙:《18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毕诺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张西平:《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0年;亨利·柯蒂埃著,唐玉清译:《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上海书店,2006年;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三、马若瑟作为来华耶稣会士索隐学派<sup>①</sup>的重要代表,他的索隐学著作体现了传教士在解释中国文化时试图融合中西两种思想文化体系所做的努力与尝试。

以白晋为代表的法国耶稣会来华传教士的索隐学派是在“礼仪之争”中最为独特的一派,他们完全不同意以阎当(Charles Maigrot, 1652—1730)为代表的那种反对耶稣会的传教路线,但他们在坚持“利玛窦路线”时又必须从理论上来回应巴黎外方传教会和道明会的批评。为了在中国传教,他们必须在中国待下去,但同时又必须为他们在华待下去找到理论的依据,因为毕竟罗马教宗已经表态,批评了耶稣会的路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白晋为代表的索隐学派产生了。对索隐学派的代表人物白晋和傅圣泽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sup>②</sup>对马若瑟的索隐学派思想很少做专题的研究,而本书中译本的问世恰好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龙伯格的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文献,包括马若瑟的索隐学派立场在欧洲所引起的争论以及马若瑟的回应。

马若瑟利用中国文化在远古时代具有部分神秘性的特点,尽量从神学的观点来解释中国文字的产生,将书契的产生归结为天,文字成为“代天之言”,这显然和许慎所强调的方向是不同的,在许慎这里已经开始对文字的产生做了历史的说明,而马若瑟在文字的产生上的解释恰恰是相反的,是利用远古文化的神秘特点,从和许慎不同的方向加以解释,将文字产生的原因重新拉回到神秘的远古时代的说

- 
- ① “索隐”这个概念在中国古籍最早出现在《周易》中,“探賁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龟。”见(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第604页,中华书局,1994年。蔡元培先生在他的《石头记索隐》中将“索隐”赋予三重含义:“品行相类”、“轶事有征”、“姓名相关”,并认为他的《红楼梦》研究是以“触类旁通,以意逆志”为其基本的方法。参阅《石头记索隐》,第1011页、1055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采用“索隐”两字来翻译“Figurists”,大体还保留着中文的原意。
- ② (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大象出版社,2006年。